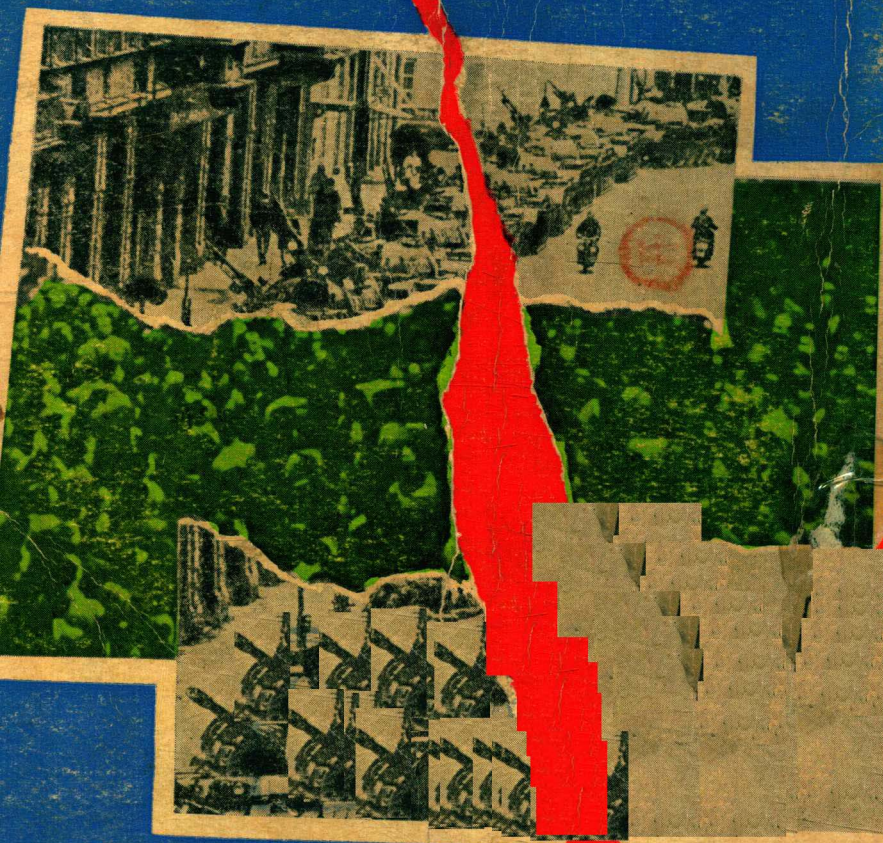


譯 培 宜 李

捷京二百日



PRAGUE'S 200 DAY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BY HARRY SCHWARTZ

今日世界出版社

捷京二百日

李宜培譯

PRAGUE'S 200 DAY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BY HARRY SCHWARTZ

PRAGUE'S 200 DAY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by Harry Schwartz. Originally Pu-
blished by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Copyright ©
1969 by Harry Schwartz.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ptember 1971

捷 京 二 百 日

哈里·施華茲著 李宜培譯

今 日 世 界 社 出 版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達 道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九龍官塘道三三六號六樓

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初 版

定 價 港 幣 三 元

— * —

封 面 設 計 : 蔡 浩 泉

序

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之春」，是許多年來最令人振奮而又最悲慘的一個季節。從一月五日起至八月廿日止的那「兩百天」裏，樣樣事都不平凡，自由主義者和民族自決主義者看着捷國奮起苦鬥，力求解放，莫不鼓舞興奮到了極點。但後來看見外軍殘酷入侵，企圖以暴力消滅捷克人民的美夢與希望，又莫不肝腸欲裂。本書只是盡量扼要正確報道捷國在這一段黃金時代的經歷，兼說明捷人突然力爭自由的這次歷史性事件的背景。捷國人民上下一心，英勇反抗的結果，使殘暴侵犯其國家主權者的圖謀，至少有一部分歸於破滅，這種難以置信的故事，也是本書所要敘述的。我不敢說一語一字，盡皆客觀。我雖然欽佩布拉格居民的英勇，但並不漠視一切有關的事實，不論好壞，全予羅列。當然，後世的史學家有了更多的證據，並研究了更多的回憶錄，和迄今尚未揭露的外交檔案後，定將針對本書所下的判斷，再加修正。不過，事實的本身太動人，太重要了，尤以事實的主要輪廓已經非常清楚，因此不容等到每一細節明朗之後，才再下筆敘述。

一九六八年二三月間和七月底我兩訪捷克之際，開始動念寫這本書。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幫了我不少忙，也告訴我許多消息，但在當前的情形下，我絕不能道出他們的姓名。我也感謝許多駐捷的新

聞界同業。他們對我協助有加，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紐約時報的藍德爾、卡恩、和伊達、華盛頓郵報的蕭哈甫，洛杉磯時報的卡魯塞斯，泰晤士報的戴維。德國同業庫克斯博士熟知捷國國情，曾於蘇軍入侵捷克之後蒞美訪問，盡以所知告我，盛情可感。自由歐洲協會的馬德對本書之完成，助力極大，因為他把協會同事們譯好的捷克報刊論文和捷克時事提要，全部供我參閱。本書草成後，哥倫比亞大學的勃朗博士不吝校閱，並提供高見，謹此致謝。本書的各項觀點，全是我個人的觀點，與我的僱主紐約時報及紐約州立大學無關，倘有錯誤，亦由作者自負。

哈里·施華茲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於紐約

目 錄

序

第一部 背景

第一章 求變原因

第二章 陰霾密佈

第三章 革命

第二部 捷京二百日

第四章 一月的沉寂

第五章 二月的叫囂

一

二三

三九

五十一

六十五

第六章 三月的醜案

七九

第七章 四月的自殺

九十五

第八章 五月的凶兆

一二一

第九章 六月的「兩千言」

一二五

第十章 七月的通牒

一三九

第十一章 八月的騙局

一五五

第三部 餘波

第十二章 入侵

一六九

第十三章 屈服

一八五

第十四章 後記

二〇九

第一章 求變原因（一九四八—六六）

一九六八年初那幾個星期裏，捷京布拉格市區的成年人，個個都是謠言販子。那時捷共第一書記諾伏尼（Antonín Novotný）剛下台，由杜契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這個波希米亞古都的居民，用不着再怕秘密警察，綽號「冰面孔」的老諾伏尼雖然仍是總統，但顯已失勢，因此人心大快，大家對於甫行完成的這次宮庭革命，也就大談其來龍去脈，各有各的理論。我特別注意的，有五個理論。

其中最動聽的，是說諾伏尼的倒台，完全與黨的首席理論家兼主席團委員亨德里樞（Jiri Hendrych）的女兒琴娜和青年作家秦·貝尼斯（Jan Benes）戀愛事件有關。「這個傻丫頭把她爸爸對全家所說的話，一古腦兒都告訴了貝尼斯，還從她老子的檔卷裏偷出一些機密文件給他，」有人對我說。「貝尼斯把這一切轉告西方某人。當然，秘密警察後來還是查出來，把這個蠢丫頭抓了。她和貝尼斯總算運氣不錯，沒有進監牢。不過她的爸爸仍不相信女兒把他出賣，反認為這個案子是諾伏尼的陰謀，

目的在故意陷害他。因此，主席團內部一旦發生危機，他投票反對諾伏尼，結果造成五票對五票的僵局，弄到主席團不得不把問題提交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委員會由激進派控制，諾伏尼於是失敗。」

另一部分人士把諾伏尼這個獨裁者的垮台原因，一直追溯到一九六四年十月間的一次事件。據說蘇共首領布列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有天從莫斯科打電話給他，談到一半的時候，諾伏尼竟敢把電話掛斷。向我透露這項消息的人說：「諾伏尼爲了赫魯曉夫被黜的事，非常生氣，他跟老赫相處得不錯，受過他的恩惠，也不止一次，因此對老赫可謂銘感肺腑。還有，諾伏尼是聽到新聞廣播，才知道老赫倒台的消息，事前蘇聯連一點兒風聲都不透露，因此他認爲這是蘇聯對他的莫大侮辱。難怪布列茲涅夫打電話向他說明經過的時候，他一肚子氣無處洩，砰的一聲就把聽筒掛上了。俄國人是忘不了這種侮辱的。去年十二月八日，諾伏尼向布列茲涅夫求救，要他到布拉格來處理危機，布列茲涅夫雖然來了，但對於諾伏尼可能被驅下台的事，實在沒有放在心裏。他認定這只是捷共內部的奪權鬥爭，不管誰登台做總統，都一樣靠得住，所以他一點不急。因此，他還說：『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你們自己解決吧，』說完就回莫斯科了。」

「一切都是斯洛伐克人的陰謀，」一位捷克人私下對我說。「諾伏尼當然是蠢才，他被擠掉，也是好事。不過，布拉狄斯拉瓦（Bratislava）的這批鄉巴老，從馬薩里克（Masaryk）的時代起就想控制全國。我們捷克人比他們精明，受的教育比他們深，也比他們有錢，所以他們嫉忌。他們一開口，就談克里曼狄斯（Clementis）和在史達林時期遇害的其他斯洛伐克人，可是你從沒聽他們提薛洛基（Široky）巴西里克（Bacilek）等那批國難期間騎在人民頭上的斯洛伐克人。他們還口出怨言，說自己

受歧視，好像完全忘了我們捷克人二十年來忍痛花在他們身上的發展金教育費，早已經超出他們應得的份了。杜契克這傢伙在斯洛伐克區當權的那些年裏，就不是什麼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現在他已一步步爬上諾伏尼的職位，結果斯洛伐克人定將掌管大權，把國事弄到一團糟。你等着瞧好了。」

可是我遇到一位憂心忡忡的斯洛伐克人，他的觀點完全相反。他說：「這批笑裏藏刀的捷克人設了圈套讓杜契克去鑽。他們從前曾把國事弄得亂糟糟，現在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就把最高的職務推給杜契克。假若他們覺得事尚可爲，一定讓自己人來充任。現在他們要杜契克代人受過，自己則到處說『你看，我們早就說過了，斯洛伐克人根本是低能的』等類的風涼話。」

最後，有一個計程車司機向我道出一番理論，並表示這是一般工人的基本意見。他說：「猶太人又當權了。納粹未來之前，這裏的錢財和一切職位，全由猶太人把持。一九四八年共黨接管的時候，真正的老闆是史蘭斯基（Slansky），和他的猶太民族主義集團。現在他們已經東山再起。杜契克不過是斯洛伐克的一個笨傀儡。你只要注意電視，就可以看到天天晚上都有戈爾史杜克（Eduard Goldstucker）的面孔在螢光幕上出現。你知道，他以前是捷國駐以色列大使。你再聽聽廣播，就可以聽到魏納（Milan Weiner）向我們洗腦。現在錫克（Ota Sik）這個猶太人要主管經濟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四日早晨，一位精力充沛的四十七歲英俊男子在他的紐約曼哈頓辦公室裏正憂心忡忡地讀着當天「紐約時報」第一版版末的一段新聞。這段消息是該報首席駐外特派員沙爾茲伯格

從巴黎發出的，其中說捷共政府準備整肅外長兼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克里曼狄斯博士（Vladimir Clementis）。捷國政府裏面的斯洛伐克籍人物，地位最高的就是他。『紐約時報』說，捷共認為克里曼狄斯「有點自主過分，」而且「帶着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分子的濃厚色彩。」捷政府覺得可疑之處，是一九四〇年法國淪陷以後他逃到倫敦的時候，英國情報人員竟輕易地讓他入境。那時大家知道他是共產黨員，而真正的共產黨員當時是最難逃過英國人的掌握的，因為蘇聯在那一段時期，正是納粹德國的好朋友。

在曼哈頓辦公室裏讀着這段新聞的那個人，正是克里曼狄斯。他完全明白文內每一字句的含義，因為他太熟悉蘇聯肅清異己的歷史了；而且他也曉得，自己的國土內，也正在進行着一次大整肅。他還知道前任捷外長馬薩里克（Jan Masaryk）實在是死於非命。官方說馬薩里克躍窗自殺，但許多人相信他是被人推出窗外摔死的。

『紐約時報』派了一名記者訪問克里曼狄斯，請他針對沙爾茲柏格發出的電訊發表意見。克里曼狄斯吩咐秘書接見，說他對於這段新聞，根本「不加重視。」他是經驗豐富的律師，精通數國語文，為人機警異常。他無動於衷的反應，實足以代表千言萬語。至少他並未否認這段消息，沒有斥它是胡說或是「資產階級捏造的謠言」，也沒有表示其他常見的反應。理由很簡單：他知道自己在捷京的敵人，只要一旦佔居上風，就可以翻出他過去的紀錄，請他上絞台。他曉得光是一九三九年自己痛斥達林跟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事，已經使東歐史達林集團的創子手振振有詞了，因為這批創子手現在正忙着搜索「狄托主義派的愛國分子。」

因此，克里曼狄斯賴在紐約任所不走，想出免調回國的種種藉口。最後，捷總統高特華爾（Klement Gottwald）命克里曼狄斯夫人以總統代表身份到紐約。她帶了一封信，說沙爾茲柏格的那篇電訊以及其他類似的消息，全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務機構的詭計，他全家絕對用不着怕。克里曼狄斯於是回到捷克。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捷官方宣佈克里曼狄斯外長已經「自請」辭職。兩月之後，他的繼任人（也是斯洛伐克人）薛洛基（Viliam Siroky）發表了一篇演說，指克里曼狄斯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偏差」。根據薛洛基的說法，克里曼狄斯的自我檢討書還未經黨當局接納，因為他「還沒有了解到本身的錯誤和缺點的嚴重性」。薛洛基又指他是「階級的敵人」，而且還有同黨。本案牽連到一大幫斯洛伐克籍知識分子，其中最受注視的有兩位最近在斯洛伐克被撤職的要員，一位是斯洛伐克半自治政府的主席胡沙克（Gustav Husak），另一位是斯洛伐克教育局局長諾伏米斯基（Ladislav Novomesky）。一九五一年初，克里曼狄斯被捕，其後迄未獲自由。

克里曼狄斯倒台後，最高興的當然是捷克書記長史蘭斯基（Rudolph Slansky）。他在國人心目中，地位僅次於高特華爾總統，從三十多年前前十幾歲起參加黨工作以來，總算爬得快的了。他身材削瘦，神態嚴肅，人人都以為他是莫斯科安置在布拉格的一名最忠實的奴才。一九四七年秋，他是共產國際發起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史達林慶祝七十歲誕辰的時候，捷共的賀詞，就是由他宣讀的。他的全盛時期，似是一九五一年夏天自慶五十誕辰的那段日子。那時克里曼狄斯入獄已經半年，史蘭斯基得到黨中央委員會的「社會主義獎章」和祝壽的賀電。捷克情報部長還寫了一篇備加讚揚的文章，

說他是「高特華爾的親密忠實同路人。」兩周後，一間飛機大工廠的工人決議把工廠改名爲「史蘭斯基飛機製造廠」，藉以「表示對於史蘭斯基同志的敬愛。」可是他是猶太人，好在捷克從未發生過反猶運動，所以據說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已經敢向高特華爾挑戰，甚至批評高特華爾不應等到一九四八年年才奪政，而早該在一九四五年就動手。

造物弄人，史蘭斯基的前途第一次罩下一層陰影，也就是在他五十誕辰那天。莫斯科的報紙對於他的華誕，根本未加理會，這件事令人訝異，覺得總不是好兆頭。九月六日，陰影更濃，因爲他突然被免黨書記長職務，自己事前連一點風聲都沒聽到。有人指控他遴選黨內職官的時候犯錯，又有人指他干預政府政策。起初，他好像只是降了一級。他調任副總理，在黨內雖然不是先前的名列第二，仍然位居第四。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國家出版機構刊印了他的言論集，總題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黨報還讚這本言論集「是研究我們黨史和提高黨員意識形態水準的重大助力。」

可是不到兩星期，身爲副總理兼黨書記的史蘭斯基被捕了。官方公報說：「直到最近，才從種種未經揭發的事態中，確切證明史蘭斯基犯了許多叛國活動的罪行。」現在史蘭斯基和克里曼狄斯是獄友了。

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間，史蘭斯基、克里曼狄斯和其他十二名被告一起受審。他們都是過去的黨政大員。他們最後全體認罪，自供是國賊、狄托分子、美國特務，至於其中十一名猶太人，更自認爲國際猶太民族運動的人員。史蘭斯基自供時，像木頭人一樣，自稱：「我從沒做過真正的共產黨員，」並說自己炙手可熱的時候，每以要職昇予「回國替帝國主義當特務的猶太資本家移

民。」從謀殺到經濟顛覆，他幾乎無罪不認。另有一個名為藍敦（Arthur London）的被告原是前外交部次長，更招供會委任托派分子為捷克駐蘇及東歐五國的外交官，並利用外交郵袋轉遞秘密情報給英國工黨左翼的下院議員齊里亞庫斯（Konni Zilliacus），而齊某就是間諜組織裏的主要人物。又有一個名為卡茲（Katz），但後來改名西門（Andrei Simoa）的被告發表了一篇自我總檢討書，其中說：「是那些國家最盛行反猶太主義和納粹主義呢？是美英。是那個國家立法制止反猶太主義和納粹主義呢？是蘇聯。我會替美英特務機關工作反蘇聯。我應該上絞台，應該受最重的刑罰。」

這次審判被盡量用來對內對外宣傳，甚至被告的家屬也在脅迫下派了用場。藍敦太太罵丈夫「賣黨叛國」，說「這羣奸宄被檢舉而無所施其詭計」後，實在令她高興，希望「國賊們受應得的懲罰。」還有一位猶太籍被告富立吉卡，他的兒子居然公開致書法官說：「法官同志，我請求你判我父重刑，判處死刑。我直到現在才知道這個畜牲是我最大最卑鄙的敵人，他簡直不配稱為人，因為他沒有一點人類尊嚴的觀念。」

審判期間，全國各界在工廠學校等地開會，要求判處全體被告死刑。這種要求之獲得採納，自是意中事。史蘭斯基、克里曼狄斯和其他九名被告同判絞刑，並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清晨在布拉格的班克拉監獄執行。另三名被告——藍敦、前外交部次長海杜（Vavro Hajdu）和前對外貿易部次長羅布爾（Eugen Loebel）——則判處終身徒刑。自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大整肅以來，最大的一次清黨審判至是結束。每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明白，假若黨政大員可以被處死，一般惹犯當局的小民，更無安全可言。舉國人民恐怖不已，歷久不息。

十六年後，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年中，羅布爾終於揭開當初認罪的經過。他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被捕，一九六〇年獲赦。這十一年的獄中生活，有五年是獨處一室。從獲赦到一九六三年，他在一座倉庫裏當小職員，後來才恢復黨籍，出任捷克國家銀行布拉的斯拉發分行行長。他當初認罪，完全是獄中痛楚難忍。下面一段，是他的自述錄摘要：

審問的時候，我須站立，不准在獄室裏坐着答，每天平均審問十六時：其間有兩小時休息（他就在這兩小時內睡覺）。獄卒每十分鐘敲門一次，我須立即起身立正報告：「第一四七三號獄犯報告：本獄犯體力良好，一切正常。」起初兩三夜，給獄卒這樣吵醒了一次，我自然無法再睡。後來我實在太倦，所以每次報告之後，納頭便睡。每夜總要這樣被吵醒三十或四十次。有時門拍得震天價响，我依然熟睡如死，於是獄卒闖進來，一腳把我踢起身。另一種手法是餓。長期吃不飽，睡不安，白天久站，穿硬皮拖鞋走路——這樣加在一起，實在是無法形容的虐待。兩三星期後，我雙足發腫，稍為動一下，就周身痛楚不堪。盥洗是大苦事；舉足前行，步步痛徹骨髓。審問由三名官員輪流爲之，痛罵、侮辱、恫嚇，永無盡期。一個問題，問後又問，反復不已，令人不堪其煩。

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間審訊次級人物的經過，也與上述情形大同小異。胡沙克、諾伏米斯基、戈爾史杜克等人都分別在規定的時限內認罪，不過他們比較幸運，只被判處徒刑。他們跟羅布爾一樣，保

了一條生命，日後得以再露頭角。

被告的口供，自然都是無中生有；定罪的人，個個是無辜。直到一九六八年，外界才知道這次審訊的起因。據一名秘密警察頭子追憶十七年前的事說，米高揚於一九五一年由蘇聯到達布拉格，說波匈兩國已開始審訊狄托分子，而被認為狄托主義大本營的捷克斯洛伐克，反而沒有審訊。高特華爾總統對於米高揚的主張，當時曾加反對，後來米高揚打電話向史達林請示，史達林下令捷國必須如法泡製，高特華爾只好俯首聽命。

布拉格城裏有一個人却因史蘭斯基的倒台而平步青雲。早在一九五二年大家就預料到了。這人是諾伏尼，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以機械員出身而在黨部裏力求上爬而起初爬得很慢的傢伙。一九五一那年，諾伏尼已接任史蘭斯基在黨秘書處和主席團內的職位。根據當時國家安全部長巴西里克的暗示，諾伏尼在史蘭斯基、克里曼狄斯及其他被告受審的時候，曾特別賣力捏造各個被告的罪名，論功行賞，自然有他的一份。

諾伏尼對人無情，更缺乏知識分子的氣質，完全是個黨棍，最大的本領是懂得利用黨機構去操縱別人。一九五三年，高特華爾忽然逝世，諾伏尼立時成為黨魁，在以黨治國的原則下，也就是全國的操縱人。四年後，他自冠總統之名，公然為一國之長。莫斯科所以特別欣賞他，大概就是因為他默頭呆腦，是個俯首帖耳的苦幹者，不是好出風頭才華超卓而又廣樹自己勢力，陰謀欺主造反的人。

捷共奪政是一九四八年，至於一九五二至五四年的大審訊，只是史達林奪取捷國後進一步要它陷於冰冷恐怖境地的明顯徵兆。真真假假，政敵，入獄者數以萬計，絕大多數是無名人物。反對黨俱遭

消滅，另換上一批傀儡政黨來掩人耳目，讓外界發生錯覺，以為國家政權並未由共黨獨享。捷克對西方的經濟文化關係，全告斷絕，跟着鐵幕低垂。學校、報館、戲院、電影、廣播、電視、全部變成宣傳工具，跟蘇聯內的情形，一模一樣。圖書館一律受清查，億萬冊傳播「資產階級」危險思想的書籍被溶成紙漿。秘密警察密佈每街每廈，日夜監視着廣大居民的一舉一動。東歐諸國以捷克淪共最晚，但其統治者急起直追，施行史達林改制的步驟，特別徹底、迅速、忠實。

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逮捕審訊行動，目的是恫嚇全國百姓，防止民間出現有組織的反政府運動。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後，首先遭殃的固然是真正的反共分子，但搜捕的對象，跟着就擴大及於「潛在的敵人」，連許多共產黨員也難倖免。猶太人，二次大戰期間在捷境跟納粹德軍作戰的民軍人員，一度與西方盟軍並肩作戰的捷國官兵，甚至與蘇軍並肩作戰的士兵，都是整肅的最佳對象。

史伏波達（Ludvik Svoboda）（按即一九六七年捷國革新時期的總統）的遭遇最為奇特。他原是捷軍的一名中校，納粹德軍攻佔布拉格後，他改名換姓，過着流亡生活，到了四十年代初期，忽得蘇聯賞識，請他指揮當時在蘇聯境內編組的一支捷軍。史伏波達的這支部隊在烏克蘭跟蘇聯紅軍並肩作戰，因此他在這裏結識了赫魯曉夫。戰後，他在貝尼斯（Edvard Benes）總統的內閣裏任「無黨派」的國防部長。一九四八年捷共奪政之際，他下令軍隊勿動，無形中就是放手讓共黨暢所欲言。可是他雖然卓著功勳，得到不少蘇聯的獎章，但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仍不免成為階下囚。出獄後，他在集體農場當記帳員，適巧有一天赫魯曉夫蒞臨布拉格，表示要跟「老朋友史伏波達」見見面。捷共當局好不容易才把他尋到，擁着他去見那位從莫斯科來的主子。當然，史伏波達立時恢復黨籍，等赫魯曉夫離